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王垠 2017/3/2

緒論 賦予歷史記憶真正有尊嚴的框架

- 《無力哀求》一書指出，一個對過往創傷無力哀悼的社會，會影響到的，不僅是當事者自己的世代，而且還會繼續影響到後世子孫。p. 19

- 本書主要探討的重點，在於德國在兩次轉型正義過程中，產生過哪些問題？有過哪些爭議？他們如何面對？如何反省缺失在何處？後續又如何尋求解決之道？p. 22

- 辛波絲卡〈在世紀的尾聲〉p. 23-24

我們的二十世紀本來應該比以前更好
現在它已經來不及證明這一點了
它的年事已高
步履蹣跚
呼吸急促

發生了太多
本來不該發生的事
而那些本來應該到來的
沒有到來

春天和快樂本來要和其他的事物一樣
是該更加接近的

恐懼本來應該離開山頂和峽谷
真相應該比謊言
更快抵達目的地

有些不幸
本來應該不再發生
比如說戰爭
飢荒 以及其他

無助之人的無助
還有信任之類的東西
本來應該受到尊重

誰想要享受這個世界
他面臨的就是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

• 面對台灣，我們也該透過轉型正義連結到的歷史記憶好好探問：威權政治及黨國體制為什麼可以長期地踐踏台灣人民的生命尊嚴？共犯結構如何形成？

p. 29

• 台灣民主化所走的路，並不像德國、南非或中東歐那樣，是透過轉型正義來引領民主轉型；反而是先透過公民社會逐漸成熟，來催化民主轉型，最後再回過頭來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 p. 29

第一篇在記憶傷口上重生：柏林

1. 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 威瑪共和現代性：「新女性」、「達達主義」、「新切事主義」、「公寓型社區」、「波茨坦廣場」。p. 35-44

• Gorge Grosz 《共和國裡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機器人》這幅畫點出威瑪共和內在一個致命的大問題：具有民主素養、公民思想與獨立思考判斷能力的共和國公民人數並不多。（近因：普魯士軍國主義；遠因：中古時代市民階層遭摧殘）

p. 47-48

• 希特勒現代性：以許培爾設計的「大會堂」為代表。p. 49-50

• 德國統一回歸人性：「總理府」、「國會辦公大樓」、「國會大廈玻璃穹窿頂」（英國 Sir Norman Forster 設計，代表民主政治的公開透明） p. 52-55

2. 五月八日：邁向轉型正義的崎嶇之路

• 1949 年西德第一任總統霍伊斯說：「基本上，5 月 8 日對我們每個人而言，兼具高度悲劇性與值得高度質疑的歷史弔詭性。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既被拯救、同時也被毀滅。」p. 60 1952 年霍伊斯親自造訪勃根-貝爾森集中營，發表〈以肅穆敬畏之心站在死亡面前〉演講（1919 至 1945 年間，猶太人真正經歷了「猶太人大離散 (diaspora) 的歷史」最恐怖的階段。在人類史上，這是前所未見的。p. 91），致詞結束後，他一一念出在這個集中營受難者的名字。p. 62

• 附錄 1 勃根-貝爾森集中營：《安妮日記》Anne Frank 和她的姊姊 (Margot) 的紀念碑；電影《美麗人生》的構想題材；納粹戰犯的第一場審判，為耶路撒冷審判與法蘭克福審判打下基礎；第一個官方紀念園區。p. 88-90

• 「去納粹化」的轉型正義，在 1945 年雅爾達會議達成共識，波茲坦會議正式確認。 p. 66

• 1948 年，冷戰對峙情勢已成，美國對德國的轉型正義政策突然起了個大轉彎。過去被排除在政府公職、司法界、企業管理階層的前納粹重要統治菁英幾乎都得到敗部復活的機會。p. 68

• 1955 年第一個終戰十週年，西德艾德諾政府迴避在 5 月 8 日舉行任何儀式。1965 年第二個終戰週年，法蘭克福審判尚在進行中（1961 年耶路撒冷審判艾希

曼)，西德聯邦政府對此沒有做出任何回應。p. 74

- 映照著政治高層對納粹過往的噤聲不語，甚至懷有相當強烈的防衛心理，最終釀成為時超過十年的「六八學運」。p. 75

- 1970年社民黨執政，西德國會第一次舉行紀念5月8日終戰的官方儀式。Willy Brandt「華沙之跪」，這一跪為西德政治樹立了以「道歉認錯」的政策方針，來概括承受納粹罪責的不變方向。

- 1975年終戰三十週年，西德總統雪爾首次稱5月8日是德國人「自省的時刻」。p. 77

- 1985年終戰四十週年爆發美國雷根總統與西德柯爾總理的「比特堡事件」。面對質疑，西德總統魏茨克發表〈紀念歐洲終戰四十週年國會紀念演說〉，為德國轉型正義精神立下無可取代的里程碑的定義（歷史記憶的一天、反省的一天、解放日）。承認過去犯錯的意義在於：大家都活在過去的錯誤遺留下來的重大後果裡，而且深受羈絆。他強調，過去的歷史是無法超克的，因為過去無法改變。但是，閉眼不看過去，只會造成對當下現狀的盲目。這場意義非凡的演講，讓六八學運這個世代的人終於「可以小心翼翼的重返自己的家園，過去我們一直是以異鄉人的身分住在自己的家鄉」。78-84

3. 保存柏林猶太生活圈與加害者的記憶

- 用“Holocaust”指稱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是1970年代末期後才開始的現象。在此之前，一般是延續納粹時代所說的「最終解決」。p. 94

- 「新猶太會堂」的說明板：「這個猶太會堂已有一百年歷史。在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它曾被納粹縱火焚燒。在1939-1945年的二戰期間，它又在1943年的轟炸中被毀。這個敬拜上帝之所的正面牆面應該永遠留作警惕世人以及保存歷史記憶之處。慎勿遺忘。大柏林地區猶太人社群理事會。1966年9月」。p. 96

- 1944年奧地利作家Egon Friedell故居新懸掛紀念牌寫著：「1938年3月16日，因為害怕被納粹衝鋒隊（SA）拘捕，它從這棟房子樓上跳下身亡」。p. 97

- 被害者記憶：猶太墓園銅雕《法西斯暴政下的猶太人》；被掏空的圖書館裝置藝術；紀念石；《離去的空間》。p. 98-104

4. 德國反抗運動的歷史記憶

- 玫瑰街2-4號的反抗活動，納粹統治時期最大規模的民眾自發性抗議，參與抗議的人絕大多數是女性。P. 110-112

- 1939年德國工匠Georg Elser以個人之舉企圖在慕尼黑啤酒屋暗殺希特勒。p. 112

- Hampel夫婦以個人之力發起明信片反抗運動。P. 113

- 蘇菲·蕭爾與他的哥哥漢斯「白玫瑰」反抗組織，透過「艾米淑淑」與毛奇伯爵的努力，「白玫瑰」勇於犧牲的反抗精神終於被許多人所認識，成為德國中學歷史教科書在講述納粹歷史時，一定會提到的年輕人抗暴典範。P. 115-117

- 毛奇伯爵反抗希特勒的地下組織「克萊騷小組」，「華爾奇麗亞行動」，暗殺

希特勒不幸失敗，當時的最高指揮中心現在改為「德國反抗運動紀念園區」，中庭有紀念雕像《雙手被綑綁的年輕人》。P. 118-122

第二篇紀念園區、紀念碑、與史料展

5. 「恐怖政治地形館」裡的加害者與共犯（一）

- 位於布蘭登堡門右手邊的「恐怖政治地形館」，過去是納粹國安部的總部，也就是蓋世太保、納粹黨衛軍、納粹衝鋒隊運籌帷幄中心。它不是哀悼受難者的紀念園區，而是揭露納粹「加害者」與「共犯」如何做下無數傷天害理之事的歷史資訊中心。P. 131-135

- 2015年 Longerich 出版《希特勒傳》，是與專業心理分析團隊一起討論後的研究成果，認為希特勒是很典型從自卑轉為狂妄自大的偏差人格。P. 137-139

- 2016年《我的奮鬥》解禁，慕尼黑現代史研究所發行註釋版的《我的奮鬥》，註釋的重點在於，把這本書放回當時書寫的歷史脈絡來解讀，拆穿希特勒只抓住片面事實來製造德國社會無端恐慌的企圖。 P. 139-144

6. 「恐怖政治地形館」裡的加害者與共犯（二）

- 漢娜·鄂蘭在《責任與判斷》一書說：「在討論這些課題，尤其是對納粹罪行做出全盤式的道德譴責時，經常被忽略的是，真正與道德相關的問題不應歸因到納粹的所作所為，而在於那些不是出於信念而只想『附和去當打手』之輩的作為」。P. 147-148

- 雅斯培斯在《德國罪責問題》分成四種：刑法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形而上的。P. 148

- 社會心理學家 Harald Welzer 2005 出版《加害者：尋常百姓如何變成殺人魔》，透過「得利者的群體感」這個概念來解釋大屠殺產生的原因。當「我群/我者」與「他群/他者」的區分被主流社會的道德想像絕對化與合理化後，隨即會產生主流社會自視為「貴」、並將被排擠的社群歸類為「賤」的清楚劃分。P. 153-154

- Welzer 認為漢娜·鄂蘭說納粹共犯是「邪惡的平庸」之化身，其實不夠貼切；書寫《現代性與大屠殺》的波蘭裔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n 所說「精打細算下向惡勢力靠攏」的說法更能讓大家明白。 P. 156

- Welzer 以魯安達種族大屠殺為例，提到加害者完全把大屠殺當「工作」、或是「義務/責任」看待。正是在這一點上，每個社會都有可能發生大屠殺；而每個社會也都有一批潛在的躍躍欲試之徒，他們不需要等到正式命令下達，只要社會有一些不寬容的氛圍形成，就會迫不及待對主流社會默許「人人皆可誅之」的人動手。P. 156

7. 「歐洲猶太受難者紀念碑」與受難者群體之間的競爭

- 「歐洲猶太受難者紀念碑」位於柏林美國大使館旁，由美國建築師 Peter Eisenmann 設計。整個紀念碑林與周邊的道路並沒有清楚的界線隔開來。這個抽象的設計意象彷彿訴說著，過去闇黑歷史就是在大家沒有特別注意到的情況下，

悄悄滲進城市生活各個面向。P. 160

- 根據 Benz 的統計，波蘭受難犧牲的平民百姓高達 550 萬人（包括 270 萬猶太人），俄國高達 1800 萬人（包括 210 萬猶太人）。波蘭政論家 Adam Krzeminski 抗議說：就德國二十一世紀的「歷史記憶政策」而言，波蘭絕對稱的上是最夠格的試金石，它是德國發動毀滅性行動的第一個受害者。P. 164

8. 聯邦政府紀念碑「新崗哨」引發的爭議

- 在菩提樹下大道上的「新崗哨」位於洪堡大學旁。
- Koselleck 指出，柯爾政府在「新崗哨」放置的複製放大版《聖母哀子像》所刻的銘文：「獻給因戰爭與暴政而受難的所有犧牲者」。我們應該思考：相對於有 600 萬猶太人被屠殺的事實，我們也有大約同樣數字的軍人死於戰火。然而在這個銘文裡，所有人都被歸類成死在同一個獨裁政權暴政下。P. 173-177
- 從圖像學的角度來看，《聖母哀子像》蘊含排除對猶太人與婦女悼念的可能性。然而，「猶太人」與「婦女」正是遭受納粹殘害最深的兩種人群。P. 177-178
- Koselleck 撰寫《我們被允許遺忘誰？》，提醒德國政府一定要重視「把一條人命當一條人命認真看待」的基本原則。他呼籲在悼念 600 萬被屠殺的猶太受難者之餘，也不要忘記還有為數可觀的辛提與羅姆人、同性戀者、身障者、智障者、被強迫結紮者、被迫安樂死者，這些無辜的受難者，加起來超過 1500 萬人。P. 178-179

9. 「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與多元的歷史記憶

- 1 月 27 日所以被聯合國訂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是基於 1945 年 1 月 27 日是德波邊境奧許維茨集中營被蘇聯紅軍解放之日。這個紀念日紀念的不只是狹義的「猶太受難者」，也是廣義的「納粹暴政受難者」。過去德國對納粹暴行的紀念是以 11 月 9 日為主，因為 1938 年那天晚上發生史稱的「水晶之夜」。P. 181-183
- 多元的歷史記憶包括：「歐洲猶太人受難紀念碑」、「被納粹屠殺的同性戀受難者紀念碑」、「納粹暴政下辛提與羅姆人受難者紀念碑」。P. 187-189

- 「納粹暴政下辛提與羅姆人受難者紀念碑」是由以色列藝術家 Dani Karavan 設計。在綠蔭下池塘中豎的三角形石板上，每天都會放上一朵鮮花，「就像每天獻上的禱告，提醒我們永遠不可忘記，永遠不可忘記。」p. 189-191

- 柏林「恐怖政治地形館」展出有關納粹時期刑事犯罪警察為「吉普塞人」所建立的「種族資料檔案」，詳細記錄每個辛提人與羅姆人的「種族生物特徵」。P. 191

10. 轉型正義教育不是愛國教育

- 德國《明鏡周刊》2008 年 45 期封面故事以亨利·興勒為題，是「史上最殘酷的大屠殺執行者」。P. 195

- 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由庫伊佩擔任建築師，基地接近三角形，三角形是最能「引發極度恐懼感的幾何圖形」。集中營的指揮所就位在三角形頂端刻意規畫出的正三角形區塊上，象徵絕對權威的絕對控制。初期被送來此地的包括希特勒最深惡痛絕的重刑犯，後來逐步轉型為系統性滅絕猶太人、辛提與羅姆人、與同性戀者的場所。1944 年時，這裡監禁的囚犯全都是男性，超過九成是外國人，主要來

自俄國與波蘭。P. 196-202

• 「告白教會」的精神領袖馬丁·尼莫勒的名言：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站出來說話

——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P. 206

• 東德的俄軍佔領區內，薩克森豪森的特別監獄是最大的，稱為「史達林在德國的集中營」，總共監禁 6 萬人左右，其中有 12000 人因營養不良、生病而死。

P. 212-213

• 薩克森豪森紀念園區面對兩個迫害人命的歷史記憶：一是納粹集中營，一是蘇聯特別監獄。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讓參訪者在「集中營」與「蘇聯特別監獄」兩個歷史記憶之間，自行慢慢建構出屬於自己的歷史記憶，避免落入過去東德意識形態與愛國教育的窠臼。P. 214

11. 女性集中營裡的法國人類學家

• 「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不僅是為女性設置，更特別的是，這裡幾乎是全歐女性反抗運動者匯集之處。營區裡設有西門子公司的廠房，女性囚犯像奴工班做苦勞。用加重勞役殺人不見血的方法，讓受刑人自行步上「緩慢滅絕」之路

p. 217-224

• 法國人類學家傑曼·緹昂監禁於此：有三本著作

a 《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回憶錄》：「小白兔」醫療實驗的道德灰色地帶；「維希症候群」；「去人性化」的管制措施，對人的道德心靈造成的傷害難以估算。

p. 223-234

b 《地獄裡供差遣的奴工：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輕歌劇》，以藝術和黑色幽默來驅散恐懼，入祀法國先賢祠。p. 224-225

c 《戰爭與和平的鬥爭》，強調「不可因愛國心犧牲真理」。p. 234

• 附錄 2-女性集中營與性暴力、慰安婦：「強暴之所以該被視為暴行，不是這個行為只圖肉慾滿足，而是為了展現暴力與權力」。p. 237

12. 德國軍方涉入納粹暴行有多深？國防軍史料展掀起的風波？

• 德國從軍人數共 1800 萬人，包括納粹黨的「納粹武裝黨衛軍，和德國軍方的「國防軍」。波茲坦會議確認「去納粹化」政策的執行對象是納粹黨籍成員；國防軍則根據日內瓦公約，對為國家效忠的參戰軍人的法律保護，免受戰爭罪責之起訴。p. 245

• 德國軍方涉入納粹暴行有多深？

a 國防軍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以「紅鬍子行動」為名，無預警進軍俄國，大肆屠殺無辜百姓、虐待戰俘。

b 國防軍軍令：只要看到蒙古人或亞洲人，基本上一律都可射殺。

c 國防軍以虐待、飢餓對待蘇俄紅軍戰俘，有超過 300 萬紅軍戰俘在國防軍看守下死亡。p. 246-248

• 國防軍史料展掀起的風波？漢堡社會學研究所《毀滅性戰爭：國防軍的罪行，1941-1944》巡迴展

a 展覽內容：占領白俄羅斯、塞爾維亞屠殺平民百姓、入侵史達林格勒。

b 踩到德國社會一條隱而未顯的心理防線：是否可以將當時上前線作戰的 1800 萬名德國男性，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冠上「毀滅性戰爭共犯」的罪名？

c 從兩個方面周全處理：不要從單一化的角度宣稱、應對「納粹國防軍」與二戰後成立的「聯邦國防軍」之間的關係做適度釐清。

d 國防軍各級軍官士兵應該負起戰爭罪責的至少占百分之五，約幾十萬人。如果德國社會不能好好釐清這幾十萬人的戰爭罪責問題，那只能說「國防軍作為一個整體，雖然沒有被判有罪，但也沒有被宣告無罪。」p. 249-255

第三篇錯誤歷史記憶的困局：德勒斯登

13. 德勒斯登為何被空襲？死傷人數為何那麼重要？

• 德勒斯登為何被空襲？

a 負責轟炸的盟軍指揮官 Arthur Harris 說：「德勒斯登事實上是大量軍需品的供應重鎮，保護完好的政府運籌中心，也是重要的交通轉運樞紐。」

b 英美「迅雷一擊行動」計畫，希望透過摧毀一個至今仍未遭到強力攻擊的德國大城，快速瓦解德國民心士氣，以讓納粹政權壽終正寢。p. 262

• 死傷人數為何那麼重要？

a 第一個說法是 Frederick Taylor 在《德勒斯登：1945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二》寫道：高達六位數的罹難者數目，有可能是納粹宣傳者鼓吹出來的，吸引右派激進份子渲染成「德國大屠殺」，死亡人數應該介於 25000 至 40000 人之間。

b 第二個說法是德勒斯登「歷史學者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所寫：應重新查證罹難者人數究竟有多少。

c 第三個說法是柏林「恐怖政治地形中心」2015 年的特展《1945 年的德國：終戰前幾個月》的詮釋：約有 25000 人罹難。納粹媒體報導，超過 20 萬名死者。迄今這個數目主要是極右派激進團體在散布。p. 272-274

• 沒有好好釐清過去，不只影響了現在，而且已經開始不斷在影響著未來。

p. 278

14. 對德勒斯登空襲不同的見證與記憶（一）：德國作家凱斯特內

• 如你們所做的美夢，德國將不知覺醒。

因為你們那麼愚蠢，而且根本不是上帝的選民。

總有一天人們會說：

想透過這群人來建立國家根本是奢望。p. 282

• 面對難以挽回的失敗，古羅馬將軍都會自己撲向敵人刺出的劍。而這樣借用別人的手來自殺的行為，就是目前第三帝國所做的。第三帝國正在謀殺自己，但屍體卻叫德國。p. 289

• 宣傳可以達到許多目的，可以美化大家不知道的真相。宣傳是一種染色劑，一旦它開始胡作非為，對事實大肆顛倒是非，就有助於政治競爭。p. 290

15. 對德勒斯登空襲不同的見證與記憶（二）德國語言學家克倫培勒

• 從 16 歲起克倫培勒就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並且維持到過世不久。將所寫日記出版《我要寫下歷史見證直到最後一刻》，他說：「這裡寫的不是關於發生的大事，而是關於獨裁專政下的日常生活，這是日後容易被遺忘的部份。」被蚊子叮一千下比頭部被揍一拳嚴重。我觀察、記錄這些被蚊子叮咬的種種…」p. 295

• 他個人的認同完全是德國人。他說：「我一定要堅持：是心靈，而非血統決定究竟誰是德國人。」p. 298

• 2 月 13 日克倫培勒接到遣送集中營的通知，當晚盟軍轟炸德勒斯登，竟將他從悲慘的既定命運徹底拯救出來。他用「失去時間感」與「比較鬆了一口氣」來形容當時的心境。P. 302-304

16. 對德勒斯登空襲不同的見證與記憶（三）美國作家馮內果

• 馮內果因緣際會遇上德勒斯登大空襲，索性躲在一座屠宰場地下室，才能躲過這場浩劫，平安返回美國。P. 306

• 他將小說的書名訂為《第五號屠宰場、或兒童十字軍：與死亡跳支不得不跳的舞》，書寫的基調：寫戰爭，卻完全不推崇戰爭行為。P. 309

• 當時美國反戰示威運動遍及全國，馮內果適時地借用德勒斯登的故事，結合 1969 年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成功，留下巨大的月球荒蕪影像，強烈地與當時美國人反戰的澎湃心緒互相唱和。P. 313

• 馮內果以小說家渲染誇張的寫法，對抗當時政界與歷史學界共同織成的沉默噤聲。四十年後，這樣的渲染誇張讓新納粹有了鼓動人心的著力點。P. 314

17. 肩負起有責任感的歷史記憶：德勒斯登空襲紀念對德國社會造成的重大影響

• 自 1949 年起，東德「紀念德勒斯登大空襲」被視為最能將二戰傷痛記憶在地化、公開化的事件，p. 320

• 1982 年德勒斯登青少年自發團體「狼皮陣線」，自行籌辦一場和平運動，反抗政府以軍隊日益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催化了東德社會快速走上和平運動之路。P. 324-326

• 兩德統一，德東地區有些人覺得自己淪為二等公民，「新納粹」與 2014 年新興的種族主義團體「歐洲愛國者反西歐伊斯蘭化陣線」(Pegida) 找到見縫插針的機會。P. 326

• 歷史記憶固然重要，但是「肩負起有責任感的歷史記憶」更是責無旁貸。P. 327

第四篇 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

18.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怎樣開放的？

- 1990年東德人民議會通過「秘密警察檔案開放法」，為顧及統一，東德後來讓步。接受兩德統一後的國會可以不接受東德人民議會所制定的「秘密警察檔案開放法」。P. 334-336

- 兩德統一後，任命高克牧師為首任「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特任官，由他聘任 Geiger 為館長，他是支持東德秘密警察檔案開放幕後最重要的推手。基於「資訊自主權」，他認為人民有權知道，在國家公權力行使上，「誰」(who) 在「何時」(when) 記錄了關於個人的「什麼」(what)。調閱檔案時，關於第三者的資料，先將檔案影印，再以塗黑的方式遮住第三者的姓名。P. 336-338

- 1991年德國國會通過新的「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法」，主管機關應該提供受難者個人相關的檔案資料，並協助受到不公不義對待的人進行司法訴訟，以讓冤屈獲得平反。比舊法更開放，受害者不僅可以知道線民的化名，還可以知道真名。
P. 338-339

19. 面對檔案開放後的狂風暴雨

- 1990年1月15日，大批東德民眾占領東柏林國安部總部，點燃東德民主革命風潮的熱火。P. 342

- 高克在回憶錄《夏天裡的冬天，秋天裡的春天》，回顧處理線民那幾年，真是一段「驚濤駭浪的歲月」。與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相關的關鍵字「IM」，指的是「非正職雇用的線民」。東德國安部正式員工有9萬名，非正式雇用、但積極合作的線民有17萬4千名。在東德共產黨統治下，「告密」被視為對國家忠誠的具體表現。P. 342-343

- 線民風暴

- a 洪堡大學校長 Fink 具線民身分，無限期解聘。

- b 高克牧師兩度與秘密警察接觸，遭政敵攻擊，向法院提起告訴。

- c「柯爾判決」。柯爾勝訴的理由：一個人若非東德秘密警察共犯結構裡的一員，也非從中獲利者，那他就擁有與自己相關資訊的自主權，別人不可調閱他的檔案。此反映出「個人資訊自主權」與「媒體自由」這兩個民主社會核心價值之間的緊張拉扯。2002年法律修正為：為維護學術研究自由、言論自由，與人格權等基本權利，與「影響當代歷史的重要人物」的檔案是否開放，由聯邦專責政務官裁決，不需要得到當事人同意。344-348

- 德國處理轉型正義的模式非常重視「知」的權利，也很重視透過釐清歷史真相，建立有責任感與前瞻性的歷史記憶。這與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著重在眾目睽睽的公開場合讓加害人與被害人進行的和解做法不同。 P. 350

- 1992年與1994年，德國分別就刑法、行政法、就業法等不同需求制定「平反法」，訂有一定的實施效期。根據統計，兩德統一20年來，透過秘密警察檔案館的司法協助，有超過96000個個案向法院提出刑事上平反的訴訟。P. 351

20. 英國歷史學者如何面對秘密檔案裡的自己？

- 布朗特爵士，擔任倫敦柯陶藝術學院院長。承認自己在1930年代在劍橋大

學就讀時，參與「劍橋五人組」，為蘇俄從事間諜工作，1979年首相柴契爾褫奪他的「爵士」。P. 353

- John Banville 將布朗特的故事寫成小說《誰能奈他何？》，討論何以共產黨統治對戰前某些英國知識精英具有如此的致命吸引力？何以某些知識分子檯面上以熱愛心靈自由的藝術創作博取世人掌聲，檯面下卻樂於為極權政府服務？p. 353

- 牛津大學歷史系 Ash 教授，發現秘密警察檔案庫裡有厚達 325 頁是關於他的情資檔案，代號為「羅密歐」，為此，他寫成一本書《檔案裡的個人史》（中譯本《檔案羅密歐》）。P. 354-358

- a 認為環境對人的影響確實很深。在扭曲的環境裡，因為人性的脆弱與人善於自我欺瞞，大部分的人往往任由不公不義的環境來形塑自己的行為與選擇。

- b 東德情治機構之所以能吸納這麼多人成為線民，加入共犯結構，與二次戰後很多人成為沒有父親可以陪伴長大的失怙兒，或父親成為被審判的納粹戰犯有很大的關係。

21. 秘密檔案裡的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 2006 年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出版回憶錄《剝洋蔥》，揭露參加「希特勒青少年團」及「納粹武裝黨衛軍」的過往。他的內心有兩個自我，一個是「血肉的自我」，另一個是「文學的自我」。他寫這本回憶錄不是要對長年隱瞞的謊言做告解，以求獲得救贖；而是相信藝術永恆的價值，因此願意將自我坦露在歷史記憶的書寫面前。P. 361-363

- 根據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葛拉斯資料，徐立特出版《監視葛拉斯：秘密警察檔案》：

- a 秘密警察檔案是為了提供情資給一個操弄意識形態戰爭的國家機器而寫。

- b 閱讀檔案時，永遠要記得，必須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不要全部當真。P. 363-367

- 東德線民之所以無法真正確實解讀葛拉斯在東德的言行，有部分原因應該是受他們自己刻板的意識形態教育所限。葛拉斯說：「因為我既批評西德的政局，也批評東德的政局。對兩邊批評的力道是一樣的。從東德人思想言行的習慣來看，這是難以想像的。」p. 369

- 檔案開放與否，葛拉斯認為，直到東德政權垮台，東德秘密警察才真正地控制了東德人，因為秘密警察檔案讓西德人認為，每個東德人都有可能是間諜或線民。這種偏見是造成現在德國社會內部分裂很重要的因素。P. 369

- 葛拉斯說：「過度渲染秘密警察檔案的絕對重要性來進行轉型正義，是錯誤的方法。大家都沒有考量到，這些情資是在何種政治壓力下寫出來的。」p. 370

第五篇收拾善後，轉換悲情

22. PRIMO LEVI 的文學世界與歷史記憶裡的灰色地帶

- 1946 年 LEVI 完成集中營回憶錄《如果這算是人》

- a LEVI 大聲疾呼歷史記憶的重要，在書的開頭他寫了一首詩

我要求大家記住下面這些話：
好好省思發生過的這些事吧！
將它們刻在你們的心上
不管在家裡，還是外出走在街上
不管入睡或晨起
告訴你們的孩子也要記住這些話。
不然，有一天你家房子會崩塌
你會被疾病所苦。
你們的孩子會棄你們於不顧。

b 集中營是道德灰色地帶，正反兩個極端所謂的「聖人」或「禽獸」，在此都屬極少數。在第八章〈善與惡的彼岸〉寫道：「囚犯彼此間發生偷竊行為，通常都會祭以處罰，但偷的人和被偷的人受到的處罰一樣多。」

c 這樣描寫向納粹輸誠的人：「如果讓他擁有可以操控一群歹命人生死大權的機會，他會搖身一變成為殘酷暴君，因為他深知，如果他不這麼做，會有另一個人搶走這個位置。此外，在被壓迫時，他內心滿懷的怨恨無以宣洩，現在就可加倍奉還到其他受難者身上。」

d 納粹之所以能瘋狂進行大屠殺，主要就是將人物化、工具化，第二章以「跌落谷底」來形容集中營的生活。P. 376-383

• 1986年 LEVI 出版《淹沒與獲救》

a 集中營受難者之間互相欺凌，有些人自甘成為納粹走狗，欺負剛被送來集中營的新難友。

b 第三章〈恥辱〉說：「我們這些生還者不僅是比例極小下一群不尋常的少數，我們也靠著言語閃爍、別具能力，或運氣夠好而躲過致命災厄，沒有真正觸到集中營悲慘的最底層。這些死去的人才是集中營真正的常態，我們這些生還者都是例外。」p. 384-385

• 與 LEVI 立場類似，鄂蘭關心的，是普世性「惡之本質」的問題。在她心目中，若要好好討論這個問題，除了檢討納粹罪行外，也應將猶太人何以願意加入納粹加害者共犯集團，一起迫害自己同胞的問題一併討論。P. 386

• 過去與「歷史記憶」相關的討論傾向於強調「記憶」連結到「認同」。Ginzburg 說：「我們把歷史這個概念斬釘截鐵地連結到記憶是有問題的。我們喜歡把歷史視為人類的集體記憶，但集體記憶之所以能夠成立的前提是遺忘。在近現代國族主義或二十世紀意識形態建構中，集體記憶之所以能成立，正在於它成功地把某些東西遺漏掉。」386-388

23. 如何撫平大屠殺留下來的世代傷痛？

• 為贖罪而行動和平志工服務 (ASF)

a 1958年克萊辛法官呼籲成立。

b ASF 的志工到以色列養老院為這些自小說德語的猶太長輩服務，陪他們讀童年時的德文書，也從這些生還者口中親聆他們訴說過去的歷史，了解他們的感受。

c 1967 年起，ASF 更在德波邊境的奧許維茨集中營紀念園區辦理為期二至四週的研習營。

d 1996 年起，ASF 開放名額讓非德國籍的猶太受難者後代有機會到德國相關機構服務（例如，「萬湖會議之屋紀念園區」）p. 391-392

- 萬湖會議之屋紀念園區

a 1942 年 1 月 20 日召開「萬湖會議」，由艾希曼起草快速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

b 萬湖會議之屋紀念園區，與納粹反抗者及奧許維茨集中營生還者吳爾弗息息相關。他出版《第三帝國與猶太人。史料與論文》、《第三帝國及其侍從》、《第三帝國思想的建構者：史料集》、《第三帝國時代的視覺藝術》。呼籲將「萬湖會議之屋」改為「國際研究納粹歷史及其後續效應史料中心」，但不為政府所接受。

c 為了紀念「萬湖會議」五十週年，1992 年，「萬湖會議之屋」才被改為「萬湖會議之屋紀念園區」。P. 393-399

- 可以無所不談

a 過去，在以色列，他們的視角是受難者的視角；但在這個紀念園區裡，他們開始接觸到大量加害者的資料，這讓他們有豐富的史料資源，從多元的角度慢慢建構自己對這一段歷史的認知。

b 「可以無所不談」的基礎在於，德國透過轉型正義，的確把自己打造成一個以人權與人性尊嚴為基礎的民主法治國家。

c 德國的歷史教育不再被特定保守勢力操控，而是以開放的態度，面對世界各方對他們納粹過往的質問。P. 399-400

24. 轉換悲情：重新看「戰火下的孩子輩與孫子輩」

- 戰火下的孩子輩

a 所謂「戰火下的孩子輩」是指 1928 年至 1947 年出生的那一輩德國人。

b 2000 年拉德博醫師出版《缺席的父親：從心裡分析角度看戰火下的童年帶來的影響》，指出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德國社會約有一半的老年人口受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糾纏。創傷記憶並不是規規矩矩按照時空前後次序清楚分類，在大腦裡有秩序地被儲存起來。反之，因為創傷後壓力經常不自覺地湧現，過去創傷的記憶經常會跳脫特定時空的記憶框架，不時冒出於其他正常生活的情境裡。

c 2010 年拉德博醫師出版《缺席的父親與戰爭年代的童年：超克陳年心理舊傷》，鼓勵他們寫下自己的傳記；家人多傾聽，多讓他們說出自己的傷痛經驗；最好能就醫，或參與團體治療；不要讓老人家獨自前往過去的傷心地。P. 409-412

- 戰火下的孫子輩

a 所謂「戰火下的孫子輩」指的是 1960 至 1975 年在戰後西德「經濟奇蹟」裡成長起來的那一代德國人。

b 2001 年，前總理柯爾的太太安內蘿瑞自殺身亡，成為國際矚目的新聞。她少女時代被強暴的陰影，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夢魘。兩個兒子相繼為她寫了傳記，

揭露了光鮮亮麗政治家庭背後的陰暗與不堪。

c Bode, 於 2009 年出版《戰火下的孫子輩。被遺忘世代承受的重擔》。呼籲「戰火下的孩子輩」用「無所不談」的開放心態, 跟自己的孩子好好談自己家庭真正的故事, 不要再用遮掩的方式迴避家人之間的溝通、對話。P. 412-415

25. 追求具有「公共化意義」的歷史記憶

• 布痕瓦德紀念園區的教育不再以「歷史記憶」為主要出發點, 而是以低門檻的參與式學習, 不斷讓大家透過相互討論, 學習如何反思過去歷史的錯誤, 思考公民社會如何被打造得更穩固。P. 421-422

• Volf 主張, 受難者不應將個人的記憶視為私領域的事情, 而應勇於攤在陽光下, 讓大家一起幫忙把歷史真相釐清, 讓記憶具有「公共化的意義」(public significance) p. 423

• 2002 年 Welzer 出版《爺爺不是納粹: 德國家庭記憶裡的納粹歷史與大屠殺》, 有四點直得注意:

a 很容易受到與二戰歷史相關的電視劇或電影裡的故事情節影響。

b 長輩講述的方式, 都是有選擇性的。

c 沿用納粹時代意識形態下的分類概念, 如「猶太人」、「俄國人」等。

d 對於集中營的歷史, 通常會用「我們當時並不知情」輕輕帶過。P. 424-425

• 2010 年德國《時代週報》的調查, 德國社會對納粹歷史過往的認知, 親情的糾結對後代子孫產生的影響, 要到第四代(曾孫輩)才會鬆開。P. 427

• 「後轉型正義階段」

a Koselleck 認為, 「加害者」應有自覺與勇氣, 看看過去的錯誤如何給自己帶來萬劫不復的悲劇及重大傷亡, 以至於成為自己錯誤行為下的「受害者」

b 如何在具有普世價值覺知的基礎上, 讓各種「噤聲」的記憶走向公開化。

c 此刻當下, 願意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在照見過去的同時, 也以誠實的愛與悲憫的公義為未來的傷口復原預備道路。P. 427-429

延伸閱讀

1. 辛波絲卡著, 陳黎·張芬齡譯, 2011, 《辛波絲卡詩集》, 寶瓶

◎詩人與世界—1996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詞摘要

• 只要他們能夠不斷地發現新的挑戰, 他們的工作便是一趟永無終止的冒險。困難和挫敗絕對壓不扁他們的好奇心, 一大堆新的疑問會自他們解決過的問題中產生。不論靈感是什麼, 它衍生自接連不斷的「我不知道」。

• 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每一首詩都可視為回應這句話所做的努力, 但是他在紙頁上才剛寫下最後一個句點, 便開始猶豫, 開始體悟到眼前這個答覆是絕對不完滿而可被摒棄的純代用品。於是詩人繼續嘗試, 他們這份對自我的不滿所發展出來的一連串成果, 遲早會被文學史家用巨大的紙夾夾放在一起, 命名為他們的「作品全集」。

2. 葛拉斯著, 魏育青等譯, 2009, 《剝洋蔥》, 時報

◎楊照導讀, 〈艱難的悲傷與記憶—讀葛拉斯的《剝洋蔥》〉

• 回憶錄，誠實的回憶錄，只能不斷依違在肯定、否定與半信半疑之間，像葛拉斯在《剝洋蔥》裡所做的。我們的記憶沒有那麼可靠，真實沒有那麼容易被原樣保存下來，訴諸記憶復原真實，是一件遠比藉虛構描繪想像事件，還艱難、辛苦萬分的事。

• 記憶、往事，包裹在一層層的洋蔥皮裡，這是貫串這本書最主要的譬喻。那一層層的洋蔥皮不一定按照時間順序，而是由各種自我扭曲與裝飾安排結構起來的。必須剝掉外面一層，才看得到裡面那層皮上究竟刻寫了什麼。而每剝一層，嗆鼻難受刺激淚水的氣味就濃上一分，回憶，不會是一件愉快的事。

3. ELIE WIESEL 著，陳慕美譯，2011，《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左岸

◎英文新譯本作者序

- 一切純屬幸運罷了。不過，既然活了下來，我就該為我的存活賦予某些意義。
- 在那裡，非人性才是人性，有紀律而受過教育的人身著制服前來殺戮。
- 今天，《夜》已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必讀教材。
- 證人強迫自己做見證，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也為了明日即將誕生的孩子。

他不想讓自己的過去變成他們的未來。

4. 英格·蕭爾著，周全譯，2003，《白玫瑰 一九四三》，左岸

◎白玫瑰傳單

國家從來就不是目的，唯有當它成為讓人類實現目標的條件時，它才具有重要性。人類的目標不外是提升所有個人的力量，來促成進步。如果有任何國家體制阻撓個人內在力量的發揮、妨礙思想的進步，即使它的思想再細密、結構再完備，它還是無用和有害的。

5.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著，周全譯，2005，《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左岸

◎序幕

那個國家運用恐怖的威脅，勒令該平民捨棄自己的男女朋友、拋開自己的想法來採納官方的論點。並要求他以自己不習慣的方式來行禮、按照自己不喜歡的模式來吃喝、把閒暇時間用於令自己深惡痛絕的活動、獻身於自己所抗拒的冒險行為，更進而逼迫他否定過去與自我。尤有甚者，他必須不斷為上述事項公開表達狂熱的興奮與感謝之意。